试论雍乾之际士大夫风气的转变

郭 成 康

人们对中国古代的士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把士大夫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群体加以考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士大夫与士还有区别。士通过科甲而入仕，便成了士大夫。由于他们在朝的地位，士大夫往往不如在野的士那样超脱，但士的批判常常停留在理论阶段，对现实政治影响甚微，而士大夫的批判却有可能推动政治的实施。在士大夫身上，现实的、政治的色彩更浓厚。因此，研究某一历史时期士大夫的动向，其意义不仅在于认识中国文化传统，而且还在于加深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了解。

一

清朝士大夫的风气到了雍乾之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已逐渐丧失了士大夫关怀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而沦为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封建皇帝的附庸。这一转变固然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总趋势所决定的，但也打上了满洲古老传统与历史意识的深刻烙印。

满洲初兴，汉族士人往往被掠为奴，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

皇太极即位后，出于政治上集权的需要，通过开科取士等渠道，将没为奴仆的汉族士人拔出为民，其中的佼佼者如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被超擢而进入文馆。但即使在这时，皇太极对汉族儒臣的猜忌防范也并未消失，在他看来，这批人只不过是与鹰犬无异的奴才而已，理应象鹰犬那样默默地出力报效主人的恩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范文程等便成了满族统治者按主奴名分彻底驯化的第一批汉族士大夫。

入关以后，大量汉族士大夫通过种种途径进入了新朝的统治集团，科道谏议制度的全面恢复，使他们找到了实现“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的机遇，也提供了朋分角立、党同伐异的新舞台。顺治时期，翰詹科道等年轻士大夫一度侃侃直言，或条陈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用汉人，或疏言逃人之弊，但却往往因此而遭到重谴，甚至流徙、论斩，致使科道言官不得不顾及身家利害，“凡犯人主之疑忌者，悉皆隐忍不言”。①

康熙帝亲政后的几十年间，是清前期政治相对开明、士大夫言论和思想相对自由一点的时期。康熙不曾处分言官，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确实作到了不以文字罪人。可惜到了他的晚年仍然发动了震惊朝野的《南山集》狱案，这足以说明，在统治集团内部思想自由也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总而言之，从清定鼎中原到康熙末这八十年间，汉族士大夫中的某些人从传统立身行事的标准出发，自恃风节，时触忌讳，虽与满洲统治者发生了种种冲突，但并没有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这一时期满洲统治者把镇压的重点指向坚持民族意识与民族气节的未入仕的汉族士人。况且，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还主要集中在皇权同强藩及八旗勋旧的反复较量

上。顺治帝与擅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康熙帝与四辅臣，特别是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的明争暗斗，把各种政治集团、政治势力，以至和尚、道士、西洋传教士等都卷了进来，士大夫作为潜能极大的政治势力当然不会置身事外，他们分门别户，各自报效其主，康熙帝为处理这空前繁剧的事务而心血殆尽，对此作一番彻底洗荡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新即位的雍正帝的肩上。正是在这一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清朝士大夫风气的转变才进入了关键阶段。

二

雍正帝以"振数百年之颓风"②的雄伟气魄大刀阔斧地对整个官场开始整肃。他首先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了与自己具有同等实力的皇八子与皇十四子党，反过手来又剪锄了日渐跋扈、危及皇权的年羹尧、隆科多两大集团。在这一过程中，雍正蓄意制造了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钱名世谀诗案和查嗣庭日记案，其目的在于告诫汉族士大夫不得涉足满洲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之争。这三起文字狱可以说纯粹是从政治斗争着眼的，但却开了钳制士大夫思想的恶例。其后，雍正帝又通过打击李绂、谢济世为代表的所谓"科甲朋党"，进而摧残士大夫的气节，奴化、驯化士大夫。

李绂，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五十九年即超擢为内阁学士，雍正帝即位后对他极为器重，先授广西巡抚，旋召为直隶总督，而李绂入京即参河南巡抚田文镜蹂践士人，极言田文镜所劾属吏黄振国、邵言纶、汪诚皆枉。田文镜是汉军正蓝旗人，监生出身，从雍正三年起连参科甲出身的河南府县官黄、邵、汪等。为反击李绂，他以李绂与黄振国等同年党庇，劾其袒护。这一政潮还未平息，新任御史谢济世又奏参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大罪。雍正帝在李、田互参案中不直李绂，故掷还谢济世折，谢坚持己见，雍正帝大怒，以谢奏与李绂所奏一一吻合，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夺谢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鞫，由此而激起了一场打击所谓科甲朋党的轩然大波。

雍正帝在下令逮讯谢济世之前，就已杀气腾腾地扬言不惜为正人心风俗而诛戮谏官，但这并没吓倒谢济世，当刑部堂官诘问他受何人主使时，他昂首回答："某自幼读孔、孟书，知事上以忠荩—— 即为孔、孟主使也！"③这是对强权的公然藐视。而李绂骨头之硬，也绝不在谢济世以下。据全祖望的记载，李绂因参田文镜入狱，大学士等拟死罪二十有四，"狱成，世益为公危，顾公处之泰然。在囚中，日读书，昼饱啖，夜熟眠，若不知有忧患者。时故甘抚胡君期恒亦以事在系，叹曰：真铁汉也！"④李绂和谢济世是真正躬行实践、里表如一的道学家，他们身上那令人主畏惮的凛然正气，他们那特立独行、临事不苟免、生死不动心的超人勇气，足以证明一代受到孔、孟思想哺育的士大夫已经成长起来了。这些人与清初高标"华夷之辨"、坚持民族气节的明遗民不同，他们政治立场是拥清的，但却在与专制君主相对峙的时候，坚持着源远流长的宝贵臣节。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与田文镜的矛盾已远远超出了某一具体问题是非曲直的狭隘范围，而上升为士大夫应否保持和发扬古大臣的高风亮节，这一古老的、然而又是关系着历代兴衰荣枯的政治原则问题了。

对雍正帝来说，他也自然，而且必然地要从究竟应确立何种君臣关系才能使清朝长治久安的政治原则着眼来处理他所面临的严峻局面。

事实上雍正帝对君臣关系应有的准则早有成熟的见解。雍正二年著《朋党论》，在大辟朋党的同时，把清初诸帝朦胧中的君臣关系作了明晰的理论阐述："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

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⑤把人臣的最高标准确定为与君同好恶，与君同是非，其结果必然从根本上取消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抹煞士大夫的气节。这种单向的君臣关系与士大夫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大相径庭的。

孔子讲君臣，虽说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又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⑥，即君待臣以礼与臣事君以忠是双向的，有条件的。如果君使臣不以礼怎么办？孔子没有说，他的私淑弟子孟子则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⑦孟子还公然宣言暴君纣为践踏“仁义”的“一夫”：“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⑧在孟子看来，君不是绝对的，只有实行仁义，才称得上君。而仁义的标准不是君的好恶是非，而是民，所以他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⑨。这样把维护以仁义为核心的道视为己任的士，尽管在政统中可与君结为君臣关系，但在道统上，则应以师傅自居，至少是王侯的朋友。战国时郭隗对燕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伯（霸）者与臣处”⑩，就清楚地表达了士人的这一愿望。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尽管经历汉、宋、明一千多年的演变，臣的义务日益绝对化，君的地位几乎达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但孔孟所阐发的君臣关系准则仍在一代又一代士大夫中得到肯定和赞颂，并成为他们在危难时汲取精神力量的不尽源泉。

清初以来士大夫在与满洲统治者奴化政策斗争时发扬的正是这个宝贵的传统，而满洲统治者力加摧锄的也是这令其绝对不能容忍的刚烈气节。

谢济世因参田文镜拟斩，雍正帝命从宽遣戍阿尔泰军前效力，后又以私著经书、发泄对雍正帝的不满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与他同时被绑赴刑场执行的还有著《通鉴论》获罪的陆生楠，当陆生楠被砍掉脑袋，谢济世正引颈待戮时，却突然宣布了免死的特旨。与谢济世有类似遭遇，被宣判死刑而又奉旨免死的，还有李绂、孙嘉淦、杨名时等深孚众望的理学名臣。雍正帝为什么对这些士大夫领袖采取如此手段？全祖望就雍正帝终不杀李绂一事说：“世宗始终念公，特以其性刚，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后湔洗之，而复用之”⑪。雍正不是昏暴之君，他虽不能容忍李、谢等人的刚正之气，但又深惜其才，而从他的经验中，又知道人是可以奴化的，其要诀在给予此人不曾亦不敢想望的地位，而对李、谢这样的铁汉，则可按照同样的思路赐他们第二次生命。雍正帝相信，经过这一番痛加“摧折”李、谢等人不难成为田文镜、张廷玉那样驯顺的能吏。

由此看来，科甲出身、珍惜臣节的李绂、谢济世与出身旗员的驯顺能吏田文镜水火不相容，而雍正帝最终彻底地站到了田文镜一边，都不能说是偶然的。传统士大夫所维护的价值观念与满洲统治者的古老传统和历史意识的冲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关头，君权彻底压碎臣节的一个时代开始了，尽管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为维护自己独立思想、独立人格还在不屈不挠地苦斗着，但整个士大夫群体政治品节的堕落则大势已定，很难逆转了。

三

乾隆即位，力求在“皇考”的严猛与“皇祖“的宽缓之间不偏不倚地走一条折中路线，但在经历了雍正朝的严刻政治之后，其政策的实施却只能处处以“将世宗时事翻案”⑫的形

式出现。李绂、孙嘉淦、谢济世、杨名时等一大批在前朝备受挫辱的刚正大臣重新被起用；以文字罪人被明令禁止，并从法制上给予一定的保障；乾隆帝还屡屡下诏求言，广开言路。而新任左都御史的孙嘉淦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痛陈雍正时"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的弊害，希望春秋正富、汲汲求治的乾隆帝以圣人自期，"时时事事常守""不敢自是之心"⑬。"不敢自是"，是对雍正的以君之好恶为好恶、君之是非为是非的君臣关系准则的否定，因此孙嘉淦向乾隆帝所描绘的"众正盈朝"、"谏争切磋"、"严惮匡拂"的理想政治局面，实质上也就是孔孟所阐释的君道臣节的复归。

但乾隆帝很快觉察出，在政策调整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弊端。在他即位还不到两年的时候，他便向群臣倾诉了"为君难"的苦衷，"崇尚宽大，则启废弛之渐；稍事振作，则长苛刻之风。言路不开，则耳目壅蔽；将欲达聪明目，而无稽之言、勿询之谋，驰骛并进，不惟不足以集思广益，且足以淆乱是非"⑭。随着事态的发展，乾隆帝越来越感受到这个曾使他的列祖列宗左右为难的问题的困扰，并沿着事物发展的逻辑重新回到他曾力图矫正的"皇考"老路上去。这期间，使他深受触动的事件至少有：鄂尔泰、张廷玉的门户之争导致满汉臣工的朋分角立；被超拔的大学士赵国麟假道学面目的暴露；以骨鲠见称的仲永檀却与鄂尔泰大公子鄂容安暗结党援；谢济世、胡中藻等私相著述以诋毁程朱或讥斥时事；世臣、德沛、舒赫德等满洲士大夫也渐染华风而失去满洲淳朴本色。特别是十六年至十八年的孙嘉淦伪奏稿案，使乾隆帝痛感已到了对士大夫的言论、思想、作风、行为，以至整个世道人心不能不加以彻底整饬的时候了！二十一年在批谕庄有恭的奏折时，乾隆帝自述："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⑮。这表明，走完了人生旅途之半的乾隆帝已逐渐摆脱掉幼年时启蒙师傅朱轼、嵇曾筠等名儒的影响，开始以真正的乾隆风格驾驭着整个中国的政治。

在发动胡中藻诗狱前夕，乾隆帝反复学习了"皇考"处置查嗣庭等人的谕旨；在处分言官，以折天下敢言之气的手法上，乾隆帝也从"皇考"那里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不难看出，无论是制造文字狱，还是惩处科道，乾隆总是学雍正的样子，首先祭起反朋党的大旗，因此往往能高屋建瓴、理直气壮。然而，公平地讲，在士大夫范围内搞文字狱与钳制言路，乾隆比雍正要平和得多，但所收效果却超过了雍正，奥妙究竟在哪里？

比雍正的高明之处，乾隆更注重禁锢思想。士大夫首先要有独立思想，然后才谈得到是否有勇气发表以至争取它的实现。我们所说的士大夫的品格，或士大夫的气节，应该是二者的统一。雍正打击的锋芒在于后者，即摧垮士大夫的"刚性"，震慑其不敢发表，当然也谈不到实现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但这样做还仅仅停留在浅层次上，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比较缓和，因此在摧折士大夫刚气的同时，乾隆帝更注重泯灭他们的思想。思想本来是一块只属于本人的绝对安全的领域，即使笔之于书，只要束之高阁，秘而不宣，外人也无可奈何。但乾隆自有对付的妙法：从抄家发展到检查士大夫的一切文字。尹嘉铨先逮捕后抄家且不论，被斩立决的胡中藻则是先看着不顺眼，然后从他的《坚磨生诗钞》中慢慢地罗织罪状，至于庄有恭、周琬、蒋炳、张照，以及舒赫德等人也都动因细故，奉旨严查一切文字。抄得的诗文笔札经过御览认为尚无悖逆怨望之词还算幸运，否则就可能"即行正法"（前往伊犁搜查周琬字迹的大臣便奉有"一面奏闻，一切即行正法"的谕旨）。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诗文的解释往往带有随意性，很多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有的至今

也说不清，究竟是不是含沙射影。在官场弥漫着如此恐怖的氛围里，士大夫自然得出了“笔墨最宜招祸”的教训，梁诗正自述：“向在内廷之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⑯ 照这样的思路再推一层，不难得出浑沌无思想则绝对安全的结论。刘统勋、梁诗正都是科甲出身、且位至宰辅的士大夫领袖人物，他们惧祸已到了如此谨小慎微的程度，在中国士大夫史上大概算得上前无古人吧！

乾隆对士大夫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厉禁讲学和攻击道学先生。程朱理学，在清朝皇帝看来乃是化民成俗、修己治人的重要精神武器。乾隆帝自幼研究义理，即位之后，《朱子全书》也未尝释手。但他虽也号召过士大夫要精研理学，却坚决反对读书学道之人讲学，而且专挑素讲理学者的毛病，轻则说你“刻书太多”，不是真理学（德沛），说你“一生学问皆虚”（孙嘉淦），甚至与普通人结为姻亲也不够理学大臣资格（赵国麟）；重则便以欺世盗名，启标榜门户、朋党亡国之渐的罪名，要你的脑袋(尹嘉铨)。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作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而乾隆帝所要的，“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⑰ 就这一点而论，乾隆确也有别于康熙和雍正。康熙提倡理学，未尝没有砥砺士大夫名节、扭转士大夫风气的用意；雍正迫害过理学名臣，主要着眼于政治，无暇顾及程朱与陆王的门户之别；而乾隆口头上表彰理学，而实际上却以厉禁讲学、丑化道学先生的手段，彻底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视王侯的精神支柱。康雍年间不乏理学名臣，乾隆时几乎见不到以理学名世者。乾隆帝把士大夫都塑造成没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才，这在中国士大夫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龚自珍说，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并用“戮心”来形容其手段之毒辣：“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⑱。这是对满洲统治者芟夷士大夫气节的悲愤控诉，也是对雍乾以来士大夫风气堕落原因的深刻揭示。

四

士大夫的风气，绝不是一个孤立问题，它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体制的逐步强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封建专制日趋登峰造极的明清时代，君权隆升和臣节沦丧是必然的。明太祖朱元璋公然罢孟子配享，并让御用文人删去《孟子》中“民贵君轻”等85章，这很能说明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帝王对孟子所阐述的君臣关系痛恨到了什么程度。清朝皇帝虽是满族人，却比朱元璋有更深的汉文化修养，手段也更高明。雍正把孔孟捧上了天，暗地里却在阉割儒家思想中民主性精华。他批驳吕留良、曾静时先说一通孔孟如何如何地大圣大贤，然后就断章取义，把两位圣人的话加以片面解释：“孔子云：事君尽礼。又云：臣事君以忠”，“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⑲。这里，孔孟所强调的“君使臣以礼”、诛独夫纣不为弑君的另一面被忽略了。雍正还借曾静之口，把自己打扮成与尧、舜、禹、汤并列，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圣君。由此可见，清朝皇帝同历代专制帝王在对待君臣关系上并没有本质差别。

然而，清朝皇帝又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专制帝王，他们的特异之处，倒是应该进一步

探讨的。

清朝是满洲统治者通过一个多世纪的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专制帝国，这庞大国度内先后被征服的一切臣民，从赫图阿拉时期的满洲，到沈阳时期的辽东汉人和漠南蒙古，以至定鼎燕京后的关内汉人、漠北蒙古及其它所有民族，都是取得皇统地位的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奴仆。征服的人口从观念到法律被视为征服者的奴仆，在满洲社会内是天经地义的，也可以说是从白山黑水时代就存在的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传统。那时的满族（女真）还处于原始氏族制开始瓦解、奴隶制正在形成的时期，努尔哈赤就是由一个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家族长而上升为一切"诸申"，乃至辽东汉人、蒙古的国主的。皇太极即位以后，社会性质已发生飞跃的变化，但主奴名分这一传统价值观念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从皇太极公然称汉官为"鹰犬"，⑳到雍正、乾隆总把"满洲世仆"、"蒙古世仆"、"旗仆"挂在嘴边（须知没有世仆资格的汉族士大夫是等级更低的皇帝奴仆）都反映出满洲古老传统的巨大惰性。诚然，清朝皇帝接过了儒家以忠君为核心的君臣关系准则，但他们不可能以此满足，而必然进一步用主奴名分将传统的君臣关系加以改造，这一改造的理论结晶便是雍正的杰作《御制朋党论》。清帝不可能超越自身传统去裁量汉族士大夫品格，他们只能从自己的社会历史因素出发，用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去理解、品评、规范以至重新锻铸为他们所需要的奴才式士大夫的。雍乾两朝，一方面汉族士大夫中的精华为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着徒劳的奋斗，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通过科甲正途入仕的满族士大夫不断地充实着士大夫队伍。对此，雍乾二帝始终把端正士大夫风气作为一项严峻的、重大的政治课题，不惜以血腥手段（对满洲士大夫也不例外），来达到改造汉族臣节、保持满洲本色，使清朝皇统垂之永远的目的。而雍乾二帝在位时间长达80年，两人又都是威严猜厉、精力过人、热爱政务的一代雄主，所以终于取得了历代专制帝王所无法企及的伟绩：万马齐喑，九洲沉默。

※　　※　　※

雍乾之际士大夫风气的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看作是满汉两种文化传统冲突的结果。对待汉族士大夫气节之类的态度，也应该象对待任何传统文化一样，切忌感情用事，加以主观臆断，而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具体分析。另一方面，满洲古老的传统也不仅仅是主奴名分，这里只要举出清初诸帝在政治上以满洲特有的集中、统一、效率、务实的传统作风荡涤了明末官场中的污泥浊水，以至对"数百年颓风"也有所振刷，就足以把问题说明了。本文不打算全盘评价满汉两种文化，而只是想说，清前期满汉两种文化传统各个方位、不同层次的冲突，既给垂死的封建制度注入了某些生气，同时也把中国导向了另一场新的灾难的边缘，而最敏感地反映出这一趋势的就是士大夫风气的转变。

---

①《清世祖实录》卷112。

②《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一月。

③《啸亭杂录·谢济世》。

④⑪《鲒埼亭集·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

⑤《清世宗实录》卷22。

⑥《论语·八佾》。

⑦《孟子·离娄》。（下转48页）

⑯《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道光《南部县志》卷四，《食货志·田赋》。

⑱㉛㉝《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

⑲《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宪德《为仰乞圣鉴事》。

⑳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五，《户部》、《田赋》、《丈量》。

㉑档案《乾隆朝户科题本》、《田赋地丁户籍类》，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李侍尧奏《川省编审届期，清定编定审之法，以收实效事》。

㉒档案：《乾隆户科题本》，《田赋地丁户籍类》，乾隆二年正二十日，杨馝奏《钦奉恩诏事》。

㉓档案《乾隆户科题本》、《田赋地丁户籍类》，乾隆二年正月二十日，杨馝奏《钦奉恩诏事》；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硕色奏《川省编审届期，请定编审之法》。

㉔咸丰《云阳县志》卷二，《户口》。

㉕《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七年闰七月十三日宪德《为请旨事》。

㉖乾隆《四川通志》卷五，《户口》。数字中的分厘尾数略去。

㉗档案：《乾隆朝户科题本》，《田赋地丁籍类》，乾隆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硕色奏《川省编审届期，请定编审之法事》。

㉗同治《渠县志》卷八，《户口》。

㉙同治《筠连县志》卷四，《食货志·户口》。

㉚道光《綦江县志》卷二，《赋役·户口》。

㉜民国《屏山县志》卷二，《赋役志·户口》。

（上接54页）

⑧《孟子·梁惠王》。

⑨《孟子·尽心》。

⑩《战国策·燕策》。

⑫《清高宗实录》卷23。

⑬《清史稿》，本传。

⑭《清高宗实录》卷42。

⑮《清高宗实录》卷509。

⑯《清代文字狱档》，胡中藻案。

⑰《鲁迅全集》第6卷，《买〈小学大全〉记》。

⑱《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⑲《大义觉迷录》卷2。

⑳《清太宗实录》卷37。